

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William Wei¹ 汪琦²

(1. 加拿大麦科文大学亚太研究院, Alberta Edmonton T5J2P2; 2. 宁波大学商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1)

摘要: 中国特殊的宏观经济条件使得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独特的发展模式和投资动因。本文运用1987~2010年间相关数据对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应进行实证。结果显示: 只有外汇储备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而技术能力、贸易顺差、利率水平、外汇汇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负相关, 本文对此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改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建议。

关键词: 宏观经济因素; 对外直接投资; 促进效应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 (2014) 04-0066-09

一、文献回顾

以邓宁(1988, 2001)为代表的主流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 母国市场的不完全竞争所带来的企业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以及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结合在一起时才会导致国际直接投资的产生。由此, 企业之所以能对外直接投资, 在于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能获得巨大的海外收益, 并抵消海外经营的风险和成本(Caves, 1993; Buckley and Ghauri, 1999), 同时, 还应具有能够内部转移且运用于国外的优势所有权或管理能力(Barney, 1991)。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 随着亚洲跨国公司的兴起, 如何解释这些后来者通过海外投资获取资源、克服竞争劣势成为热点问题, 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并不具备所有权优势或内部化优势。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和逐渐发展, 许多学者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动因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Zhan, 1995; Wang, 2002; Child and Rodrigues, 2005; Buckley et al., 2007; Alon and McIntyre, 2008)。目前看, 这些研究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是从国际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公司国际化战略所引起的对外直接投资; 二是研究中国制度框架和相关政策对海外投资规模、产业分布模式、区域分布和企业投资动机的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 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全世界直接投资的目的主要在于资产寻求, 即对外投资是为了获取稀缺性资源, 尤其是各种知识性资源, 以提高自身能力, 这些

收稿日期: 2013-02-20。

作者简介: William Wei, 男, 经济学博士, 加拿大麦科文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 研究方向: 国际经济及国际商务; 汪琦, 女, 经济学博士, 宁波大学商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 国际经济与贸易。

角度暗示了对外直接投资并不一定与企业所有权优势相联系,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更在于通过获得战略性资产以提高竞争优势,而不是挖掘和利用企业现有的优势(Makino et al.,2002; Mathews, 2002, 2006; Child and Rodrigues, 2005)。据此,市场特征、自然资源、东道国的比较优势就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考虑因素。从目前的研究看,学者倾向于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动机分为三大类型:第一,开拓海外市场。对于这种类型的投资,东道国市场特征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一些研究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与东道国市场规模正相关,东道国市场规模每增加1%,中国企业向该国的投资就增加0.35%(Buckley et al., 2007)。其二,寻求海外资源。海外资源禀赋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另一个主要因素,尤其是1992年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瓶颈日益严重,中国企业寻求海外资源显得尤为明显(Buckley et al., 2007)。其三,资产寻求型投资,这类对外投资的动机主要是为了企业战略性发展的需要而获得战略性资产和技术能力(Deng, 2007)。Cui和Jiang(2009)研究了138个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和进入形式,他们认为,当企业采取全球战略或面对东道国的竞争以及寻求最优战略资产时,中国企业倾向于以独资形式进入东道国。而当企业进入高速增长的市场时,企业喜好以合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另外,Boisot和Meyer(2008)研究了隐藏在国际化早期阶段的中国小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他们认为,国内的一些限制如地方保护和物流不畅通导致商务成本上升,企业退出国内市场而寻求国际化,从而促使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当一些学者从企业全球战略性发展的角度研究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时,另一些学者则着重研究了制度安排与相关政策对企业海外投资的促动作用,因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包括了政府的积极活动。首先,政府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批和形成过程中起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其次,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很大程度上是被政策因素促动的行为。第三,与其他跨国公司相比,中国跨国公司较不注重成本最小化,因为有政府的扶持和政策的促动。当国内经济制度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制度环境允许中国企业通过国际化拓展自身的竞争优势时,就会促动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Voss et al., 2008)。从这个角度看,由政府扶持与银行优惠贷款等形成的企业特定优势是推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动因(Zhao and Wang, 2008)。TCL、海尔、联想的海外投资就与政府的扶持有较大的关系。资金的支持和低息贷款是决定这些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因素,也是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同时,东道国的法律体制和制度安排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影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因素(Child and Rodrigues, 2005)。另外,许多学者注重研究制度变量对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他们发现自由化政策与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Peng,2001; Buckley et al., 2007)。Voss等(2008)提出了一个基于制度变化对海外直接投资影响的模型并检验了制度变化对交易成本和市场不完善的影响。他

们认为,过去30年,尤其是1992年以来,中国海外投资的政策环境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量与海外投资相关的自由化政策推动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加。Cui 和 Jiang (2009) 探讨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决定因素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差异,他们认为,中国企业更为关注政府支持以缓解资产约束,同时也深受东道国制度和本国政府政策的影响。从资源寻求型角度看,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意在获得和扩大战略资产,所以,交易成本和战略意图是影响他们海外投资的因素。从制度寻求型角度看,他们海外投资意在获得海外市场 and 看重东道国完善的制度,所以,当他们对外投资时会根据本国政府的制度约束和激励来调整进入东道国的策略。

由于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所以,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应考虑母国经济发展的一些特性,如收入、利率水平、汇率、技术因素等(Kyrkilis and Pantelidis,2003)。由此可见,分析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宏观变量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从目前看,这种研究较少且使用的数据老化。所以,本文基于邓宁投资发展路径理论,通过模型设置来检收入、技术、汇率、利率、开放度和外汇储备等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促动效应。

二、变量选择与假设

本文研究主要宏观经济因素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促动效应,所以,以中国对外投资净额为因变量,因为该变量反映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规模,一定程度上代表中国对外投资的能力。另外,从各种理论文献看出,技术能力、收入水平、外汇汇率、经济开放度、利率水平和外汇储备等宏观因素都可能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本文以这几个宏观因素作为自变量,研究这些宏观因素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促动效应。

(一) 因变量

以1987~2010年中国对外投资净额为因变量。

(二) 自变量

1. 技术 Cantwell (1981)、Prugel (1981)、Grubaugh (1987)、Pearce (1989) 和Dunning (1993) 等人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技术能力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根据邓宁所有权优势理论,如果一个国家技术特性是信息密集型的,则对外直接投资会使得企业不同国家间开拓技术性中间产品成为可能。随着中国技术市场的发展,一些已占据国内市场的高技术企业开始寻求开拓海外市场。所以,研究技术变量与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当然,还可利用技术变量检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是战略资产寻求型的。

假设1:中国每年颁布的专利数量能反映企业对技术的投入,所以,专利数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是正相关的。

2. 收入 人均GNP与对外投资的关系是一个共识。一国的收入水平反映了该国的经济结构和竞争优势。Dunning (2001) 根据人均GNP测算指标, 以产品和产业为研究对象, 研究了经济发展4个阶段中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的不同效应。随着经济的发展, 制造业和服务业比重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增加, 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会提高, 从而需求模式也会走向产品和服务差异化, 所以, 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水平及市场规模正相关 (Buckley et al., 2007)。Liu et (2005) 也认为, 以人均GNP为代表的收入提高是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的主要原因。Kyrkilis和 Pantelidis (2007) 通过实证也表明一国收入水平与其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的统计意义。在此, 我们用真实GNP 变量来反映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高收入水平允许一个国家从事对外直接投资。

假设2: 中国的收入水平越高, 则其对外直接投资也越多。

3. 外汇汇率 从国际贸易方面看, 汇率是最重要的调整进口和出口的金融工具之一, 同样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之一。来自硬货币国家的企业比来自软货币国家的企业更能成功地从事金融投资 (Aliber, 1970)。本国低 (或低估) 汇率能鼓励出口, 但是会阻碍进口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反过来, 当母国汇率提高, 以外币表示的资产变得便宜, 就会增加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会 (Kohlhagen, 1977; Stevens, 1993)。如果一国汇率从低估或较低水平快速上升时, 会使对外投资超比例地提高。另外, 母国汇率提高意味着对外投资的交易成本下降, 从而也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Buckley et al., 2007)。

假设3: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越低,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越多。

4. 经济开放度 Kyrkilis和Pantelidis (2003) 认为, 一个国家国际贸易的开放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因为一个国家对其他经济体越开放, 本国企业对其他经济体的直接投资越容易。进出口贸易与一国开放政策 (包括外国直接投资政策) 紧密相关。可以说, 国际资本移动的开放政策对中国企业海外贸易及投资的模式和变化趋向都起了明显的作用 (Buckley et al., 2007)。我们用进出口贸易额反映中国经济的开放度, 并用贸易顺差检验FDI对贸易的替代作用。Johanson 和 Vahnle (1997) 认为投资与贸易是互相替代的战略, 在一个连续过程中, 跨国公司先是通过国际贸易开拓国际市场从而抑制对外直接投资。但随着国际贸易不断积累起东道国市场资源, 跨国公司会理性选择在东道国进行投资并就地销售, 从而减少了出口贸易。这样出口贸易增长带来的贸易盈余和直接投资之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假设4: 进出口总额与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假设5: 贸易顺差与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5. 利率 利率是一个影响资金流动的敏感因素。丰富的资本意味低利率, 但

反过来会减少国内资本的机会成本,有利于资本向国外投资 (Prugel, 1981; Clegg, 1987; Grubaugh, 1987)。所以,当国内利率水较低时,企业可能通过海外投资追求更高投资收益率。因为随着本国资本机会成本的降低,到国外进行股权融资或债务融资就更加容易 (Pantelidis and Kyrkilis, 2005)。总体来说,资本的边际效率与利率有关,低的资本边际效率意味低利率。如果母国利率下降,资本将会投资到国外以获得更高的资本收益。

假设6:母国利率越低,对外直接投资越多。

6. 外汇储备 外汇储备与一国家经济实力有关,也是支持本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最直接因素之一。Wu (2008)认为,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中国向海外投资的主要原因。中国公司正在不断增加的对外投资净额以及国家扶持和银行低息贷款都缘于庞大的外汇储备支撑。中国的高储蓄率和巨额的外汇储备是鼓励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动力。

假设7:外汇储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三、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置

为了考察中国宏观经济变量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促动效应,我们建立多重线性回归模型,设模型为:

$$\begin{aligned} \ln OFDI = & \beta_0 + \beta_1 \ln PATENTS + \beta_2 \ln GNP + \beta_3 \ln EXRATE + \beta_4 \ln TRADE \\ & + \beta_5 \ln SURRLUS + \beta_6 \ln INTERRTE + \beta_7 \ln FR + \mu_i \end{aligned} \quad (1)$$

其中, β_0 = 常数或截距, $OFDI$ = 对外直接投资净额, $PATENTS$ = 中国每年专利局登记的专利数量, GNP = 中国国民生产总值, $EXRATE$ = 美元兑人民币汇率, $TRADE$ = 进出口总额, $SURRLUS$ = 国际贸易顺差, $INTERRTE$ = 中国历年利率, FR = 历年外汇储备, μ_i = 扰动误差项,用以测度其他没有考虑进去的变量扰动。

(二) 数据说明

数据源于1987~2010年由相关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其中,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数据来自中国商务部统计资料,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额、贸易顺差、利率等数据来源于历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年鉴,汇率及外汇储备数据来自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统计资料,专利权数据来自科技部发布的历年科技统计年鉴。

(三) 模型的估计

对模型(1)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时,发现多重共线性。为了得到更有解释力的模型,我们根据AIC最小原则,对模型(1)的变量采用了向后剔除法,以排除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消除多重共线性问题。通过检验计算,移

去了变量 $LnGNP$ 和 $LnTRADE$ ，得到最后选择的模型（2）：

宏观因素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促进效应回归分析表

变量	回归模型（1）			回归模型（2）		
	β	T	VIF	β	T	VIF
β_0	36.842	3.267		33.521	7.138	
$LnPATENTS$	-1.207***	-2.737	19.366	-1.2342**	-2.831	19.318
$LnGNP$	-1.371	-1.208	50.553			
$LnTRADE$	-5.553***	-3.255	27.428	-5.8975***	-5.884	9.666
$LnTRADE$	1.055	0.903	107.788			
$LnSURRLUS$	-3.544**	-2.762	5.530	-3.7820**	-2.718	2.703
$LnINTERRTE$	-0.973*	-2.072	7.272	-0.7992*	-1.851	6.277
$LnFR$	2.085**	2.219	274.573	2.2570***	6.413	39.309
评价指标	R^2	$AdjustR^2$	df_1	df_2	$F-stat$	$P-Value$
回归模型（2）	0.9516	0.9344	5	14	55.09	0.000
回归模型（1）	0.977	0.9330	2	12	0.856	0.449

注：表中数据运用SPASS12.0软件进行回归分析而来，*代表10%显著性水平，**代表5%显著性水平，***代表1%显著性水平。

从回归分析表看，模型（2）拟合情况很好， R^2 为0.9516，调整后的 R^2 达到0.9344，表明 $LnOFDI$ 的变动中有93.44%可由自变量解释；每个回归系数的t值都是显著的；衡量回归方程显著性的F值也是显著的。得到回归方程为：

$$LnOFDI = 33.521 - 1.2342LnPATENTS - 5.8975LnEXRATE - 3.7820\beta_3LnSURRLUS - 0.7992LnINTERRTE + 2.2570LnFR. \quad (2)$$

具体来看， $\beta_1 = -1.2342$ ，说明中国专利权颁布数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在5%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专利权数量每增加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减少1.2342%。这个结果与假设是相反的。 $\beta_2 = -5.8975$ ，表明汇率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1%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每增加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减少5.8975%，由此可见，人民币升值对中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具有极为明显的拉动作用。 $\beta_3 = 3.7820$ ，表明贸易顺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5%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贸易顺差每增加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减少3.782%，这个结果说明了中国出口贸易可能与对外直接投资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 $\beta_4 = 0.7992$ ，表明利率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10%显著水平下呈负相关，利率每下降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0.7992%。这与我们的假设一致，也反映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以国内筹资为主。 $\beta_5 = 2.2570$ ，说明外汇储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1%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外汇储备每增加1%，带动对外直接投资增加2.2570%，外汇储备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GNP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作用并不显著。根据邓宁理论,人均GNP是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只有人均GNP到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一国才有可能对外直接投资。然而,国民生产总值只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收入水平,不一定直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因为人均GNP越高,国内市场机会越多,优越的机会吸引公司在国内市场发展,从而减少他们投资国外的动机。我们的研究发现,GNP对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促动作用并不显著。

四、结论与建议

中国企业特有的国际化模式(主要体现在由政府主导和扶持)要求从不同角度来分析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Child and Rodrigues, 2005)。中国的政策会明显影响一些宏观变量,例如汇率、利率、经济开放度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我们的研究揭示出宏观经济变量技术投入、利率、外汇汇率、贸易顺差、外汇储备等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

(一) 中国专利权授予数量与对外直接投资净额负相关

这与我们的假设不同,表明越是拥有所有权优势(技术优势)的企业,越是关注通过技术优势占据国内的市场而不是海外直接投资,因为庞大的中国国内市场能为它们提供相对安全的运营环境和丰厚的技术投资收益;另一方面也可能说明,由于中国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较薄弱,中国企业的技术优势只能局限在中国市场而无法在国际上形成垄断性优势,从而不能凭此获取巨额海外利益来抵消海外投资带来的风险和成本,部分高技术企业的对外投资也只是寻求战略性资产。从中国国情来看,对外投资主体主要为国有企业(截至2010年末,中央企业和单位占对外投资存量的77%),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多为低技术产业,如租赁、商务服务、贸易、资源开发和运输服务业为主(2010年这些行业对外投资占75%以上),真正民营高科技行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不多。由于中国政府主要扶持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而具有技术优势的民营企业无法得到政府的扶持和融资优惠,面对海外市场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出于理性选择而主攻国内市场。这就要求政府扶持政策和方向要多考虑民营企业的发展,一方面,通过财政、税收和金融等方面的扶持鼓励民营企业扩大技术投入以形成国际垄断性优势;另一方面,更应通过财税政策、金融服务、人才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扶持促动民营高技术企业凭借垄断性优势向海外投资。

(二) 外汇汇率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其统计意义在于暗示了对外直接投资是解决目前国内货币升值的一个有效途径。从中国看,1994年开始,政府改革汇率双轨制为单一制,并根据市场供求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制。199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总体平稳略有上升。不过,作为经济正在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的外汇调控依然还不是一个完全自由浮动的制度,

中国也没有完全开放资本市场。随着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中国外汇制度的改革,人民币汇率必将逐渐向一揽子管理系统转变。从长期看,人民币的逐渐升值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人民币购买力的提高会使中国企业能以较低成本获得海外资产,从而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作为企业来说,如何实现自身跨越式的发展,抓住这一机遇实现国际化战略是应着重考虑的现实问题。

(三) 贸易顺差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这个结果说明了中国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间的替代关系。即如果通过参与国际贸易就能得到合理的投资收益,则为了避免海外投资生产带来的风险和成本,中国企业倾向于国内生产、国外销售,而不是直接到海外生产。如果通过国际贸易得到的收益越多,则企业通过直接投资国际化的动机就越弱。另外,贸易壁垒的存在使得本来出口的中国企业为了躲避关税、非关税壁垒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也体现为出口与直接投资间也具有有一种替代关系。总体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是一种比国际贸易更为深化的国际化经营战略,可综合利用东道国的资源、市场和技术。所以,如果通过出口贸易带动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实现两者的互补就具有更明显的正面效果。由此,要鼓励企业实行“先对外出口,后对外投资”的行为,更要通过优惠政策扶持企业实现价值链向海外延伸,通过直接投资扩大中间产品的出口,通过扩大出口进一步支持海外生产,实现两者的互动发展。

(四) 利率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负相关

如果资金来源于国内借贷,利率会与对外投资净额负相关,但如果资金来源于外借,结果相反。中国利率水平与对外直接投资净额相关系数为负,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内,这是由中国巨额外汇储备支撑的。国内利率的变动会促进资本在国际间流入与流出。中国出于金融安全的考虑,对资本市场上的外币流通有严格限制,所以,中国对经济干预带来的利率变动是决定企业是否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这也表明,在充满波动的资本市场如何通过利率杠杆引导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流向和结构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深层次问题。

(五) 外汇储备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正相关

外汇储备对中国对外投资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Deng (2004)发现,中国政府在决定对外投资中起着关键的作用,中国政府给予国有企业鼓励和资助以满足他们对外直接投资的合理需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后,因为政府既有能力扶持国有企业海外直接投资,更出于庞大外汇储备带来的压力而鼓励国有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事实上,到2011年,中国外汇储备已达2.8万亿美元,这些外汇不仅急需向外投资以得到更多收益,更需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有效化解一系列负面影响,为汇率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开放创造宽松的环境,为进一步优化经济结构、平衡国际收支、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提供较宽松的环境,所以,实现外汇储备

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良性互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Dunning, J. H. The Eclectic (OLI) Paradigm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Business*, 2001, 8(2).
- [2] Dunning, J. H., Kim, C. and Lin, J. D. Incorporating Trade into the Investment Development Path: A Case Study of Korean and Taiwan [J].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2001, 29(2).
- [3] Barney, J. B.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
- [4] Alon, I. and McIntyre, J. R.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 [5] Child, J. and Rodrigues, 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 A Case for Theoretical Extension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05, 1(3).
- [6] Deng, P. Outward Investment by Chinese MNCs: Motivations and Implications [J]. *Business Horizons*, 2004, 47(3).
- [7] Deng, P. Investing for Strategic Resources and Its Rationale: The Case of Outward FDI from Chinese Companies [J]. *Business Horizons*, 2007, 50.
- [8] Deng, P. Why do Chinese Firms Tend to Acquire Strategic Assets in International Expansion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9, 44.
- [9] Zhan, J. Transnationalisation and Outward Investment: The Case of Chinese Firms [J].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1995, 4(3).
- [10] Cui, L. and Jiang, F. FDI Entry Mode Choice of Chinese Firms: A Strategic Behavior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09, 44(4).
- [11] Cui, L. and Jiang, F. Ownership Decisions in Chinese Outward FDI: An Integrated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Agenda [J]. *Asian Business & Management*, 2009, 8(3).

The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es of the Promoting Effects of Macroeconomic Factors on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illiam Wei WANG Qi

Abstract: As a developing and transition country, China's rapid growth of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 has attracted significant attention. Meanwhile, China's special 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make the OFDI enterprises have unique development models and investment motivation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promoting effects of several macroeconomic factors on China's OFDI through formatting models and adopting 1987~2010 data. The results show that only foreign currency reserves positively correlate with OFDI, while technology, trade surplus, interest rate and exchange rate, negatively correlates with OFDI. Lastly, this paper makes an analysis of the result and gives a suggestion about improving China's OFDI.

Key words: macroeconomic factor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motivating effects

(责任编辑: 张建华)